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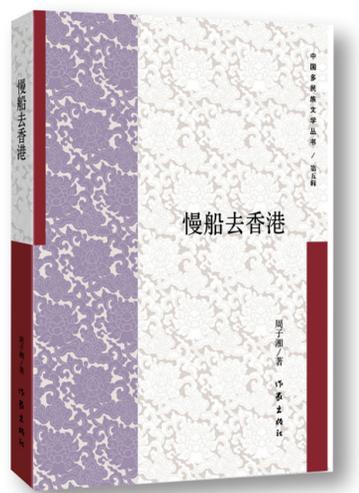
书评

一个会越走越远的写作者

□贾平凹

为促进陕西文学事业的发展,省上去年实施了“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资助计划”。这个计划实行导师带徒弟的方法,作为导师我选择了周子湘。周子湘是陕西新一拔青年作家中的好作者,有才华、勤奋、有灵气,这几年一直在不断发表作品。她的小说我几年前就读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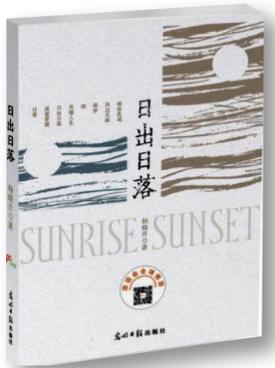
《女人花》是一个短篇,这是我当初读她的第一个小说。这篇小说写了现代商业社会中人情、人性的冷暖,塑造了不同于以往传统女性的女主人公绿月,在纷繁的城市生活中,作为一个在底层奋斗的女性,在商业竞争和生活中的挫折、裂变、成长的经历。小说探求的问题非常尖锐,当代女性在现代生活中,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属性?小说写法新颖,不落窠臼,在紧凑的故事结构中,设置多个迷雾,细致有力地展现了不同人物间的性格、情感、善恶等多重重力,将笔触深入人性深处。尤其是给女主人公安排了一个无望的结局那一笔,出人意料,令人唏嘘,我感到她作为一个年轻女作家,有一种小说写作的老到。后来的时日,我又相继读了她的一些小说,对她近年来的创作有了



读了杨晓升的两部中短篇小说集《日出日落》《身不由己》,有几个人物固执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日出日落》中的珍珠,还有把珍珠逼上绝路的巫青文;《风过无痕》中的山娃,还有沦落风尘而让山娃走上不归路的山花;另外两个是《天尽头》中的失孤老人欧阳慧琴和刘传孝。这里边,除了卷进生活大潮成为身不由己的浪中泥沙的山花之外,都是边缘人物,或者说都在被遗忘的角落。几个人物都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但都说不出来,甚至最终也没说。最是这无言令人心痛。

杨晓升的悲悯情怀和呐喊胆识

□许谋清



首先是珍珠,因家暴,两次离家出走。不过,这两次不太一样。第一次她仿佛想得不多,只是本能,受不了就跑,跑就跑跑了,虽然犯了重婚罪,情有可原,算是躲过一劫;第二次家暴,打她的是她的第二任丈夫,而她已经有6个孩子的娘,她萌生要有一点儿的尊严。但这一次后果反倒严重了,以至于她都有些后悔自责,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一出门,就被前夫裹挟,无法脱身。想回家再也回不来了,后来前夫因贩毒入狱,她自由了,可以回家了。可是现任丈夫因“颜值”不让回,寒风族风不让回,德高望重的村子里的长辈们不让回,最后连地方庙里的小神也不让回。珍珠只对眼泪汪汪的、敢说“我想娘”的小儿子说了一句:“娘这回不走了。”她把所有话都咽下,吊死在寨前的苦楝树上。死后灵魂都没有归宿。寨仔山村的人们都说:“珍珠那臭娘活着时无个好样,死时也不想积德!她好的地方不去死,咋偏偏死在咱寨前哪?真是狼心狗肺,故意辱没寨风,看把咱全寨的好运气全冲掉了。”死者默默,你让她还说什么?

可以说是巫青文逼死了珍珠,他当然要对珍珠的死负责,他是施暴者。但是,巫青文所受的伤害并不比珍珠轻。黑丰在《无望的呼告》的评论中分析这个人物:“他既是这一(男性)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又是受害者、牺牲者;他既居高临下,又匍匐于地;既施暴他人,也祸害自己;既制造罪,就必然遭罪;既造恶果,就必然自食恶果。无一幸免。这印证了一条铁律:凡不给人幸福者,自己也勿庸幸福;凡制造灾难者,自己必然遭灾,并且加倍。”巫青文这个人物本质上是个常人,所以他是矛盾的,他打珍珠,也后悔,家里没了主妇,一团糟,也盼她回来。只是各种莫名其妙的阻力让他寸步难行。他没有想到珍珠会死,更没想到珍珠死后,寨仔山村的人会把憎恨倾泻到他的身上,并把他和他的全家视为不祥之物。他觉得不对了,他仿佛是上当了,但他不敢谴责长辈,不敢怀疑至高无上的神,无以诉说,他把嘴死死地闭上了。

山娃山花是一对恋人。山花到城里寻找出路。山娃在深山苦等。山花回来了,并把自己的身子给了他。山娃哪曾想这是山花觉得对不起他采取的一种告别方式,山花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山娃精神上无法承受,他到城里去寻找山花。夜总会哪是山娃这样的人可以进去的地方?山娃愤怒了。愤怒的山娃在附近转来转去,他看见从夜总会那边过来的人,骑摩托,哼着轻浮的什么歌,这个不懂法律的山里人把他的愤怒不平发泄在那个陌生人的身上。犯罪又逃逸,一颗严打的子弹击中了他。他也许什么都还来不及想,一切都结束了。而这个时候,山花还一无所知,正躺在不属于她的暖床上。山花还可以说话,她却噤若寒蝉。

欧阳慧琴和刘传孝是一对失孤老人,想再生,生不出来,看到一个外地来的打工妹很像自己失去的女儿,认作干女儿。孤独使他们的感情方式失控,想让那女孩像亲生女儿那样,结果,物极必反,女孩离开了他们。他们有话要说吗?有。但他们不想说,一起服毒自杀了,没有留下遗言。

风过无痕,他们只是一粒粒微尘,消失了淹没了。但是,作家杨晓升听到了他们的心声。微尘属于大地,一个作家,他没有轻视微尘,他感知大地在颤抖。而我,听到一个作家咚咚的心跳。

我们经历过贫困,我们更多地去关注物质贫困而忽视了精神贫困。我们出现一个误区,以为有钱了就是富起来了。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公开赞美土豪,并冠以“土豪金”的美誉。我们忽视另一种贫困,包括富豪们的精神贫困。先富带后富是一个多么困难的话题。于是,我们会让一些人、让一些地方、让一种现象留在被遗忘的角落。

在我们的时代,像寨仔山村这般封闭已经不配称作一种文化。或者说,有活文化,有死文化。封闭是死文化。珍珠其实是身处蛮荒,是文明之风没有吹到的地方。作家杨晓升发现,就是临近大海,也还存在这样封闭的世界。杨晓升是一个敢于直面现实的作家,他把这么沉重的现实摆在读者面前。

记得《奥斯维辛没有新闻》说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有一幅照片,是一群要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从墙上俯看到奥斯维辛参观的人们。我们能不能接受这种直视,这衡量着我们对于历史反省的深度。

我在文章开头说,读了杨晓升的小说,记住6张不说话的面孔。报告文学家杨晓升是敢于呐喊的,但小说家杨晓升什么都没说,这已经足够了。

《日出日落》,杨晓升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7月1日出版

一个大致认识。

一个好的写作者,要具备一种能力,即惊人的构写力和想象力,即重新建构、打造一个世界的的能力。中篇小说《天涯厨王》、短篇小说《新加坡河的女儿》是一群中国打工者在国外的生活经历,一个复杂、多面的世界,一群小人物在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里挣扎拼搏的故事。小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中篇小说《惘然记》、短篇小说《慢船去香港》描写了一段内地人去香港的故事,写出了在命运的变故和心理欲望面前,人性的真实和命运的漂泊、多舛。

读了周子湘的小说,我感到她有整体性把握人物和生活的能力。同时,一个好的小说写作者,又应该是一个好的叙述者,懂得叙述人在生活和经历中的感受。当然,叙述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叙述中要把故事人物的灵魂写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周子湘走的是写实的路子,她有很强的写实功力。无论在人物塑造、性格刻画、故事架构、立意拓展等方面,她都敢于硬碰硬,而不绕着走。

读周子湘的小说,感到特别纯。这种纯是一种小说的品质,它不仅通过小说的语言、结构等手法表现出来,更多是渗透在小说的意蕴、气息里面,让读者可感可触。它带给读者的是一种不摆动的、专一的、不含杂质的美的享受。

同时,周子湘的小说还很正。这种正,更多是一种格局感,细密纯正,广博沉稳。小说能做到这一点,从写作上讲,一般不会有闪失。正面示人的写作也是有信心的表现。当然,这种正也是作者审美心理的体现,不使巧而追求朴拙。用心体味周子湘的语言时,感觉到一个女性作者的细腻与优美,简洁和生动。周子湘的语言是一种很到位的小说语言,一个写小说的人拥有了一种好语言,这是很幸运的事。这是功夫的锤炼,更是与生俱来的才情。

子湘有过东南亚打工的经历,不仅对彼地的人情风物稔熟,更对那块土地、那段时光有着深刻的体验。她是一个有心人,更是一个有独特艺术眼光的作家。近年来,她把笔触停留在了那段难忘的生活,探向一个个鲜活人物的内心。集中描写了一批打工者走出国门后,在异地他乡的迷茫、挣扎、奋斗的历程,用女性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心理感受,细腻刻画了一个特殊群体的生存境遇和内心的情感世界。写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体,替这些社会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说话,为当下的小说写作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这一点很难得、很可贵。作为一个年轻的小说作家,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写作是有规划的,这说明她正在走向成熟。

《慢船去香港》,周子湘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再现“和乐时光”

——浅析《少年林语堂》的文本意义 □王永盛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一个人在儿童时代的环境和思想,和他的一生有很大的关系。我对于家乡的环境所赋予我的一切,都感到很满意。”这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学大师,对家乡高度认可,让人禁不住想对孕育其生命源头的家乡一探究竟——平和坂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林语堂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怎样的童年?同为漳州平和人的作家黄荣才,用一部小说为我们作了详实而生动的描摹和还原。

《少年林语堂》是一部以林语堂的童年生活为写作对象的作品。对于作家黄荣才来说,林语堂像一座富矿,已经成为他文学创作中可以源源不断挖掘的对象。作为林语堂的乡人,他在众多研究者里占有地利之优势。这在《少年林语堂》的创作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当他人只能从故纸堆里,找寻研究林语堂的蛛丝马迹时,作者可以整日徜徉在林语堂生命的源发点,寻找其穿越百余年留下的气息,和他进行精神对话……由此写出的作品,必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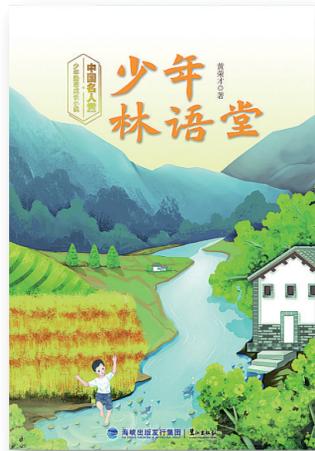
首先,小说《少年林语堂》丰富充实了林语堂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这为研究其生命成长轨迹和文学生涯,提供了新鲜、生动的资料。林语堂的小名叫“和乐”,巧的是林语堂的整个童年生活,就跟他的小名一样,恰恰是一段美好的“和乐时光”。在小说中,少年林语堂的成长环境,既有那座耸立在家门前巍峨的坂仔山,给了他眼界、视野和胸襟;也有那条让他经常去“捉虾捉小鲛鱼,泡泡水使脚清凉一下的小河”,与水相嬉、聪明慧黠;既有乐观的父亲、慈爱的母亲无微不至的爱,也有兄弟姐妹的和谐友爱和儿时玩伴们的真诚陪伴。

“和乐在墙角观察蚂蚁,他蹲在那里,看蚂蚁忙忙碌碌地跑来跑去。他知道蚂蚁在找吃的,突然,他拿起一块碎瓦片,在蚂蚁队伍中间划了一条横线,蚂蚁队形马上就乱了,惊慌失措。”少年林语堂不仅玩蚂蚁,还和玩伴比赛扔贝壳、吐荔枝核,到河里捞鱼,一起玩钓鱼、骑牛……小说在诗性的基调下,表现了朴素的乡村野趣和率真的情感。

“人的内心是自私还是充满爱心,就像刚才茶杯里的茶水。有冷的,也有后来加热的茶水,就看是冷茶多还是热茶多……我们做人,一定要爱心多一些,自私少一些,不能做自私没有控制地生长,自私生长了,就很危险,会成为魔鬼。”不管是父亲林志诚说理式的教育,还是林语堂经一事长一智的成长获得,小说便有了关于人性形成背后广阔而深邃的细密探究,文字中交织着亲情与友情的人性之光。

作者笔下的少年林语堂,是基于作者常年的研究和思考,进而将其成长方式、生活轨迹,在真实的史料基础上,以文学还原的方式,再现林语堂的童年时光。这是一种文学的探索,亦是一种想象的真实。该书将成为研究林语堂少年时代难以超越的里程碑式作品。

其次,该小说真实还原了林语堂少年成长经历、成长环境、家庭教育方式,为当代父母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教育素材和范本。林语堂在《林语堂自传》中写道:“一个人一生出发时所需要的,除了康健的身体和灵敏的感觉之外,只是一个快乐的小孩



时期——充满家庭的爱的和美丽的自然环境足够了。在这条件之下生长起来,没有人会走错的。”

在林语堂看来,快乐的童年对一个人成长至关重要,影响人的一生。小说中,林语堂父亲林至诚是一位慈祥而不失严肃的父亲,他天性乐观,酷爱说理。少年时代的林语堂,能够在宽松的生活环境中成长,在大自然中友善和谐地与玩伴们嬉戏。父亲谆谆的教诲,母亲、兄姐的慈爱,都是林语堂乐好、向上、向善、爱思考等品格形成的良好环境。他的本分、聪慧、幽默、笃定、忠厚、谦逊、立志和远见,都在彼时便已生根发芽。

比如小说中关于人要快乐、乐观的教育,林至诚多次提到:“快乐其实就是自己内心的平衡,你们把我们一文字坐到一起吃饭,就是很大的快乐了。”“遇到事情我们都要往好的地方想,这样才会快乐。以后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快乐最重要。”这些话,即使在现代社会,读起来仍然值得借鉴。

此外,从创作角度来看,《少年林语堂》亦带来了一些新鲜的实践,以文学真实走进传主心灵世界,给读者带来生命的启发。在作者的笔下,林语堂的童年时代,裹挟着闽南乡土气息,亦有山水的灵气。当地的风土人情、饮食习惯、风俗习惯、民风传承,甚至生物种类、山水走向,历经百年仍然在山乡延续,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气息在其故乡徜徉。闽西南连绵的丘陵山地,时而清静、时而狂暴的山溪,巍峨壮观的土楼,这些都使这部作品有别于一般的人物传记。

作者在小说中使用的一些日常化的、生活化的话语、想象和比喻,让人感到亲切、亲近,自觉地生发出真实感来。“和乐摸了摸自己的肚皮,心里想:这肚子真奇怪,好像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家里的水缸尽管大,要十二桶水才能装满,可究竟有装满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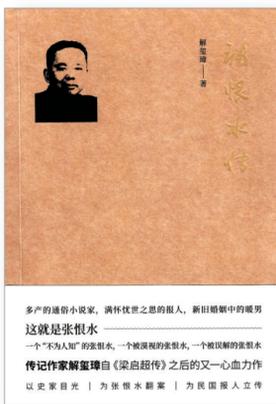
为孩子营造“和乐时光”,在温暖关爱中,呵护孩子的成长,这部作品以一种文学的真实,带我们走进大师林语堂的童年时代;以一种原创的姿态,带领我们走进伟人的心灵世界,在当下青少年写作中,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的掘进和对文化传统的守护。

《少年林语堂》,黄荣才著,鹭江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新书推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张恨水传》,解玺璋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多产的通俗小说家,满怀忧世之思的报人,新旧剧变中的硬汉——这就是张恨水。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硬骨头,一个被忽视的报人,一个被低估的报人。传记作家解玺璋自《梁启超传》之后的又一心血力作。以史家目光 | 为张恨水立传 | 为民国报人立传

对于长期以来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坛上创作产量最高的作家张恨水,当代的传记写作向来不曾怠慢。张恨水的生平材料和研究文献,也一直有人在用心搜集、不断整理。从今还易见的早些年海内外出版的三部张恨水传来,传主的生活和创作经历固然已得到了大体一致的完整展示,但人事往来的细节记载和重要创作的前因后果,还呈现着不少歧异和出入。而比这更紧要的是,这些传记叙述中的张恨水,整个的形象、神情还浸没在旧时代旧话语

的气息里。作为一个文学和社会史上的独特人物,张恨水还未能鲜明地从这些传记中树立起他自己的人格坐标,进而让今天的读者能够从拉开时空间距的方位上,既遥望他,又走近他,既用新的价值尺度衡量他,又依着历史的境遇同情他。

解玺璋的新著《张恨水传》,积七年资料考订之功,澄清、明辨了以往有关张恨水生平的多讹说,更在传记写作基于史实而成于史识的方面,做了稳扎稳打、推陈出新的尝试。全书20章,起于“家世”,终于“晚景”,中经“早教”“求学”“漂泊”“生计”“婚姻”“成名”“西游”“南迁”等历述传主关键遭逢的18章,一线贯注,脉络清晰。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纵贯加横切、叙述带评议的几章:“圈子”“帽子”和穿插连续的“报人”(上)(中)(下),以及“横祸”。

“圈子”一章里,经历了家道中落、求学受挫、谋生无着一连串苦闷曲折的青年张恨水,终于得到郝耕仁、张楚萍、张东野等朋友、族亲的引领和帮衬,踏上了以报人为业、以写作为生的道路,并且维持终生,其间的人情原委和社会成因,在夹叙夹议的梳理中,得到了周详的交待。“帽子”一章,则把在文坛成名后的张恨水推向了国新文学和新文化发展流变的全景。相对于张恨水个人的文学世界和思想天地,似近而实远的所谓“鸳鸯蝴蝶派”,过于宏大和威严的新旧文化的观念冲突、革命文学和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潮流,一方面是同时代的生动存在,一方面又确实是非属同一文化层次、同一价值谱系的外物。条分缕析的叙述中,好看的或吓人的“帽子”,终究也只是“帽子”;张恨水自有远非任何一顶“帽子”可以覆盖或代表的面目、情怀和小小的追求,这两层意思都说得明明白白。

“报人”三章,以细密的事实和文献,还张恨水是报人而非作家的职业本色。与一般只靠职业那一份薪水的作家不同,张恨水长达30年的报人生涯,贯穿了把办报当作一项事业来坚守和追求的执着。从写通讯到编副刊、再到执掌报务,从乱世中奉行不谏大词、不批评大人物、不研究高深学问,只管面包屑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民化宗旨,到抗战时创作上实现“弯弓”英姿,办报上力推战况报道和月旦人物的热血文字,张恨水的报人生涯平实而不平庸,贴近大众,却不一味取媚大众,执著里有与时俱进的变通和奋发,也有担当道义的一份庄严和急峻。

可以看出,在解玺璋这部《张恨水传》里,张恨水身为报人的一面,是被当成比他身为作家的面更深沉也更丰富的一面来写的。书中对于张恨水作品的介绍和解读篇幅并不少,笔触也相当细腻,但只有联系着“报人”三章一起来看,作者所理解和把握的张恨水才会形象更见立体、精神更有光彩。而曲终奏雅的“横祸”“晚景”两章,也正是因为有了“报人”三章的前奏和烘托,才仅凭着凝练的叙事,显出愈加沉郁顿挫的力量。

《美国电影 美国文化》,【美】约翰·贝尔顿著,米静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这部图文并茂的译著,源自美国公共电视台《美国电影》系列节目的配套读物,1994年初版问世以来,反复修订再版,目前这个译本依据的是该书2013年第4次修订的英文版。作者约翰·贝尔顿在罗格斯大学教授电影和英文课程,是学术期刊《电影史》副主编,以美国电影史、文化史,以美国经验、经典电影理论研究为专长。从这部作者以一人之力写成的美国电影史来看,他的学术背景堪称名副其实。

恰如作者在书前自序中所说:“本书假定读者没有或者接受过不多的关于电影史、理论和美学的教育,并以鼓励讨论电影整体而非单个电影的方式呈现了一些基本的问题。”但“本书不同于一般传统的电影史”,传统的电影史,无论作为教学科目,还是作为知识门类,都建立在将电影仅当作一种艺术,而对电影的研究,主要也只能通过文本细读式的新批评的方法来进行。而在作者所关注并且亲自投身其中的当代的电影研究前沿领域,电影被看成了“一个更广大的工业、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一种艺术形式”,因而对它的研究,相应地也需要依赖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和其他当代理论批评学科。由此,满足于对电影史做出客观化描述和简单阐释的传统电影史,正在被逐渐改写成内涵更加复杂、视野更加开阔的“新电影史”。《美国电影 美国文化》就是作者在建构“新电影史”方面的一份独特收获。

全书内容生发于一个核心命题:美国电影与美国身份的认同和文化,一直处于一个不断相互决定和相互塑造的过程。从这一命题出发,美国电影产生、发展和转折的每一步历程,包括制作模式、影片类型、美学风格和文化影响等层面,都牵连和对应了美国社会的认同危机和精神创伤的起落迁延。书中的章节编排和分析思路,都依此成型,形式整饬而又富有新意。新修订版中加入的《社交网络》《宿醉》《绯闻计划》《拆弹部队》《大地惊雷》《阿凡达》等近十年来出产的新片的信息和探讨,更使这部以新颖的理论主题和充实的作品剖析见长的著作,显得饱满而丰厚。